

在武昌洪山宝通禅寺的对面曾有一个天主教公墓，有两位在武昌殉道的法国遣使会士曾埋葬在这里，一位是1820年被处死的刘方济神父，一位是1840年被处死的董文学神父。

董文学神父原名若望·嘉播尔·贝波厄，1802年1月6日出生在法国南境罗特省嘉贺教区蒙澈棣本堂的普似小镇，父亲名伯多禄·贝波厄，母亲名为玛利亚·丽加尔。他在诞生的第二天就领受了圣洗圣事，当时法国的社会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教难，开始渐渐恢复宗教的和平。董文学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，共有兄弟姐妹8人，他排行老二，他家有自己房屋及农场，也请了几个工人，全家人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。这虽然是一个农民家庭，但人人都读书，幼年的董文学一般利用冬季农闲的时间在村中小学接受教育。贝波厄家都是忠实的教徒，尤其是董文学的伯父雅格。雅格是一位神父，在大教难时期曾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执行地下神父的工作。父母的熏陶和雅格伯父英勇的精神对孩子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在8人中竟有6人“为主献身”，董文学也矢志不渝地走上了“为主献身”之路。

董文学成为神父，完全是无心插柳的结果。因为是长子，父亲顺理成章地把他看作未来家业的继承者，教他种田的知识，而少年董文学也俨然像一位小农夫。至于次子路易，父亲则希望他多读些书，于是在1816年父亲把路易送到蒙托邦，在雅格伯父的学校里读书。这是一所介于中学和修院之间的教育机构，

是雅格神父在1807年创办的，目的是培育未来的司铎（指天主教、东正教的神职人员）。由于当时路易还未满10岁且体弱多病，父母便让董文学在农闲的时候去蒙托邦陪读，董文学借这个机会弥补了所缺的功课，特别是

法文（他们在乡村说的是当地方言，不是法国国语）。很快老师们就发现，董文学不仅天赋很高，而且对人热情，雅格神父于是写信给董文学的父亲，希望他能让董文学继续学习。对于长子和次子都要离家修道，父母心中自然不悦，但仍然答应由董文学自己决定。不久，董文学写信回家说：“我请求天主指引我应如何迈向天堂之道。我经过很久的祈祷之后，认为天主要我当神父，所以我开始学拉丁文。”

初入修道院不久，蒙托邦就举行一次遣使会工作大集会，成效显著，董文学深受感动，便矢志加入遣使会，并准备到中国传教，这也正是雅格神父未能实现的夙愿。1818年秋季，董文学正式要求入遣使会，神父们很乐意地接受了他的请求。在两年的考验期间，董文学谨慎地遵守初学生的制度，研究义理，持身严格，人们都称他为小圣人。1820年12月28日，董文学发了遣使会的终身愿，正式加入遣使会，并到巴黎遣使会神学院学习神学，从此他便与父母分手，不再属于他们，而属于遣使会了。

在圣多玛斯神学院里，董文学同时修圣经学、教会法典及教会历史等科目，尤其深入钻研圣多玛斯的学说，以便日后言出有据，受到众人的敬仰。3年的学习时间很快过去了，因尚未到法定的24岁，董文学还不能晋升铎品（神职人员的级别），于是被派往亚米安教区的孟地洁中学修道院，去帮助管理小修院中的小修生。到第二年，院长因赞赏他的才能，改让他在大修院教哲学课程，他同时还兼照顾一座监

在武昌被清廷绞死的

◇ 黎霞

法国传教士董文学

狱的囚犯及办理救济穷人的工作,当地人都称他为圣人。

1826年暑假期间董文学回到巴黎,9月25日在巴克路140号仁爱修女会母院之圣堂(因那时遣使会院还没有一间像样的圣堂)内,举行了晋铎典礼,主礼主教是一位新奥尔良的老传教士杜保主教。弟弟路易作为唯一的家族代表参加了晋铎典礼,以及次日在此举行的首祭弥撒。晋铎以后,董文学奉派至桑福禄大修院任教。他本人很希望去外方传教,但总会长及咨议们认为董文学的健康状况不适合去外地传教。在一年的教学中,董文学得到了同事和学生们的称赞,学生称他授课“口含芬芳,言吐蜂蜜”,主教则认为“这位年轻的教授确非泛泛之辈”,他请求总会长任命董文学为桑福禄城小修院的院长。

1827年秋天,董文学到任,当时的小修院一副七零八落的模样,总共只有30多个学生。他忙于管理校务,给目不识丁的工人讲要理,又要解决诸如缺少经费、政客干扰校务要遣散学生等问题。他有教育家的天赋,他关心每个人的健康,为学生及他们的家庭祈祷。在董文学的努力下,4年后学生增至200多人。然而,5年的惨淡经营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,于是总会长将董文学召回巴黎担任较为轻松的工作。听到这一消息,桑福禄城的很多人痛哭流涕,大修院的院长赞叹:“贝波厄神父(即董文学)真是我所认识的人中的一位完人。”

不久,发生了令董文学万分痛苦的事。1830年,弟弟路易晋

升遣使会神父后奉命到中国传教,消息传来,董文学欣喜若狂。自己因为身体衰弱而不能实现的梦想将由弟弟来实现。他给路易写了15封信,最后一封是1831年7月中旬寄往澳门的,他认为那时路易应当已经抵达澳门。然而,1832年初噩耗传来,路易在从爪哇至澳门的途中得了一种脑炎,死在了海上,并葬在海中。路易神父临终前所述遗愿:希望哥哥代替他前去中国传教。不久,姐姐玛利德在入修女院前也因病逝世。两件噩耗使董文学非常悲伤,他忙赶回家安慰父母及伯父,并向伯父重申他的请求:前往中国接替弟弟的工作。雅格神父虽劝阻他,说他的健康状况受不了传教士艰苦的生活,心中却很高兴:这个侄儿将来有一天会实现他本人的梦想。

1832年秋,董文学奉派到巴黎遣使会总院,任初学院的副院长。院长年老多病,一切院务均由他经管,同时他还兼助理修士的院长,给修士讲解圣经。对于初学生,他的教育方法就是以自己的日常生活为榜样,以自己的言行为楷模,令人折服。一位初学生纪岚神父慎重地说:“他是圣人,我从未发现在他的言语、行为上有任何缺失。”

然而董文学从未放弃去中国传教的想法。一次,他在给初学修士训话时,忧郁地说:“我已14年不断请求去中国,在我有圣召之初便有此心愿,也正为此而入遣使会的初学院及神学院。”这时巴黎母院刚接到一批刘方济神父的遗物,他是1820年在中国武昌府被绞死的。董文

学指着这些遗物说:“假如我们有一天也有这样的际遇,那是多么幸福呀!求天主使我身体强壮起来,我也能往中国去宣讲耶稣基督并为他死去!”

在董文学坚持不懈地恳求之下,机会终于来了。1835年初,又有一批传教士要去中国,董文学重提旧话,再三要求,总咨议会不得不同意由医生去决定。医生给他仔细检查身体后,表示强烈反对。然而医生在回家之后,却觉得心中烦躁不安,认为对董文学的问题有亏职守。第二天早晨,医生去见总会长,说也许长期的海洋旅行会对董文学的身体有益,总会长终于在2月2日批准了董文学的请求。董文学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,直向圣堂冲去,向圣母道出心中的谢意。初学生得知这个消息都替他高兴,他们中竟有18名要求和他一起赴中国传教。

董文学连回家探望自己的父母的时间都没有,于1835年3月21日,在哈佛港乘船离开法国,同行的有两位会友和几位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。他们南下绕过非洲好望角,经过马拉松长航,终于抵达爪哇本岛,在首都雅加达改乘英国船先去泗水,再返航雅加达,最后才去澳门,整个航程历时五个多月,1835年8月29日才在澳门登岸。

澳门是进入中国大陆的重要门户。当时澳门租借给了葡萄牙。葡萄牙遣使会士在此建立了一座修道院,旨在培育中国圣职人员。法国遣使会士也在此成立了中国传教供应站,培育遣使会修士,附设有初学院,这里也是遣使会省会长(指一个传教区)

居留处。董文学在法国遣使会院内停留了5个多月，取中文名董文学，并在一位中国遣使会李神父的指导下学习中文，他觉得中文有点难学。他这样写道：“我想学好中国话非一朝一夕之事，必须下点功夫才行。按照初步估计，我可要在秦神父和苏神父之前丢脸了。人家说从前刘（方济）神父中国话也讲得不怎么好。我以前的生活与他的类似，我希望以后也可以追随他的芳踪直到死为止。”

1835年12月21日，董文学受命前往河南，他入乡随俗，剃掉前额的头发，脑后用假发编成一条辫子，胡子留成“八”字型，穿着中国的长袍，踏上旅途。清朝早在雍正时期，政府就颁布了禁教令，严禁基督教（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）在中国传播，所以他们不得不趁夜色偷偷出发，行经福建、江西、湖北等省，全程1500公里，到1836年4月抵达武昌府——刘方济神父被绞死之地。在与其长上（上级）张导沅神父及安若望神父（二人均为法国遣使会士）会合后，董神父即随他们取道汉江，经荆门、安陆、老河口等地，巡视各会口，并体验传教士的生活。略作休整之后，董神父便独自向河南的传教中心南阳府进发，并于6月底到达。等他到达目的地——南阳府附近的靳家岗（刘方济神父昔日被捕之地）时，已是1836年8月15日。由法国启程，中间经过17个月，走了3.8万多公里，一路上时而乘船，时而步行，时而骑马，漫长而艰难的行程终于把董神父累垮了，以至于有人给他行了终传圣事。

董文学渐渐复原了，他一边筹划他的传教工作，一边跟两位中国遣使会神父继续学习中文，他计划到年底时就可以讲道、听告解了。他利用一年半的时间，与一位中国神父一起将河南教区各会口巡视一遍，因为清政府严令禁教，而地方上对传教的态度全凭地方官吏的爱憎而定，所以这是十分危险的事。当时河南教区面积大约是5万平方公里，由于刘方济神父教难风潮平息未久，不少教徒冷淡甚至放弃信教，有些教徒因为害怕也不敢与神父接触，有些教口已濒于绝境。董文学亲临各地区举行“下会”（即下会口），殷殷劝导，在他的努力下，不少人被感化入教，濒危的会口逐渐稳固。那些加入天主教的教友常聚在一起朗诵经文，与人争斗少了，还常常互相帮助。

1838年1月，张导沅神父请董文学去湖北传教。这个教区在崇山峻岭之中，董文学经长途跋涉，到达时已是6月底。这次，他处身在一个热心教友的团体中，当地有教友2000多名，分会15所，每逢主日即有千余人前来参与弥撒，这正是刘方济神父在此多年传教的成果。董神父以刘神父为榜样，勉力而为。他以沈垭茶园沟为传教中心，经常到各会口巡视，虽然山路崎岖坎坷、条件艰苦，仍满腔热忱。他经常访问教友，探望病人，救济穷人。董神父有演讲的天才，每逢瞻礼，从早到晚经堂里总是坐满听讲的人。教民中发生纠纷总是找他裁决，他总能公平处理，使双方都能接受，因此教民都乐意捐献粮物，助他发展教务。

1794年，乾隆帝再次颁布禁教令，凡欧洲人在中国内地传教的一律处以死刑。1820年，道光帝继位后略为宽容，但也并未取消禁令。董文学频繁的活动引起了一些人的疑忌，同时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。1839年，南漳县有人报官，县令也是素来反对天主教的，于是大申禁令，拘捕众多教友，其中有个年轻教徒说出了董文学等人的藏身之处。湖广总督周天爵历来反对天主教，他下令务必逮捕秘密潜入内地的“洋神父”。谷城县令胡庆奉命亲自率领衙役入山，与石花镇巡检、把总等共三四百人到沈垭悬赏缉拿董文学。

1839年9月15日，董文学正在茶园沟与安若望神父、中国会士王神父和路经这里的方济会神父李文秀为圣母圣名瞻礼，在场的教友有1500多人。当有教友说有大批官差正向茶园沟走来时，神父们并未在意，直到官兵已迫近神父们的住处，大家才慌张起来，各自逃散。安神父、王神父与李神父仓皇逃入山中，董文学并未马上跑走，他先把圣器埋藏起来后才逃入竹林中。官兵搜查了住宅之后，将圣堂和住宅付之一炬。晚上董文学才到教友李贞女家中，吃点东西，并剃掉胡须，因怕连累李家决定连夜跑到密林深处躲藏起来，同行的有李世明、邢理详等人。董文学藏身在名叫“荒草扒”的地方，山脊层叠、溪谷幽深，外人绝难找到。当时有个新入教的教徒钟成（即钟老三），因贪慕三十两纹银，先是假托给神父传信探听到董文学下落，随后连夜跑到观音堂向巡司告密，并亲自领路。到

荒草扒后，钟成大声呼喊，说有信送到，董文学信以为真，出来相见，遂被官差抓住。李世明等呼唤藏身此处的数十名教友出来相救，董文学立即出言制止，命众人各自逃生，结果仍有数十名教友被捕，包括李世明、邢理详等人。

差役抓获董文学大为高兴，让当地保正前来验明正身即行押往谷城。保正刘宗林秉性慈善，虽然不是教中人，但素来敬重董文学德行，见董文学几日来饥寒交迫、手足挫伤，无法步行这百余里山路，心中不忍，于是出钱雇了乘兜舆，并解衣脱鞋给他穿上。

到第二天深夜时分，董文学连同教友才被押解到谷城县衙，县令下令连夜提讯，问董文学为什么到中国来，途经哪里，有无他人在华传教等。董文学只是回答了与他自己有关的事，其他一律不答。对于县令他背教，则万不同意，县官大怒，让人重批颊杖然后收监。刑讯几日无果，县令只好把他们押往襄阳府。在襄阳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又刑讯四次，每次半日，酷刑加身而董神父隐忍不发一丝怨言，无奈之下押往省府武昌。

湖广总督周天爵性格暴虐且反对洋教，他先后提讯董文学达20多次，所有新奇酷烈之刑具一一加身，而董文学安之若素，虽然浑身筋骨伤损，依然毫无怨尤。周天爵疑他修炼邪术而不知痛苦，令人取黑狗血让他喝下，董文学亦强忍喝下，因他常在心中将自己所受磨难与耶稣相比，心中以能为主献身为荣。让他难过的是，被捕的教友中有

2/3的人背教，但余下的教友都信念坚定，愿意接受处罚而不背教，周天爵更觉怪异，认为是董文学用迷药使他们迷失了心智。

1840年1月15日，周天爵最后一次提讯董文学及同难教友，说如果他们肯背教就判无罪，然而董文学等宁愿受罚。最后周天爵以“蛊惑中国人民”和“冒犯皇上禁令”罪判处他死刑。之后董文学就被关押在死牢里等候秋决。

自定案以后，牢房的待遇就人道了许多，董文学的善良、忍耐及坚信也引起了狱卒和其他囚犯的敬重。一位传道员冯安德可以经常进去探视、照顾董文学，他甚至依照董文学的要求把杨安德神父带来听他告解，之后董文学用拉丁文给同会神父们写了几句话，记述受难情形，这张沾有他血迹的纸，即是他的遗书。

1840年9月11日批文送到，按例立刻行刑。董文学被绑在十字架上，从容接受绞刑。董文学被绞3次才死去，死后神态安详，目闭唇合。

董文学的尸体被悬在木架上示众，直到第二天清晨，官兵将其尸体装入棺材，与其他同刑的5名犯人尸体一同运往犯人墓地掩埋。牧区代权主教命教友不惜代价，贿赂差官，将董文学尸身换回，葬于洪山墓园，靠近刘方济神父坟墓旁边。

董文学死后不到3年，即1843年7月9日，教宗额我略十六世批准称之为“可敬者”，并转告遣使会会长立刻依法着手在中国和法国收集与董文学有关

的一切资料。

1858年5月22日，时任江西大司牧的遣使会田类思，奉罗马教宗及本会总会长委命，亲到武昌邀请湖广鉴牧徐伯达连同秘书、证人等，启验圣骸并重新装殓运回法国。

1899年5月30日，教宗良十三世，降旨布告可敬者若望·嘉播尔·贝波厄（即董文学）准列入“真福品”，并于11月9日举行庆敬典礼。

1996年6月2日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降旨布告列若望·嘉播尔·贝波厄入“圣人品”。

董文学来华传教正值近代前夜，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，颁布了禁教令，凡是西人来华传教的即处死刑。西方宗教伴随着舰炮，堂而皇之地传到中国，这本身就打上了侵略的烙印，有些传教士还直接充当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，但董文学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忍受着艰苦的环境，在中国传教，其坚忍不拔的精神、矢志不渝的信念，还是值得钦佩的。

（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研究生）